

孔子登泰山

● 周岩壁

泰山居五岳之首,称为岱宗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登泰山有重大意义。孔子重视礼仪,自然不能忽视泰山。孔子还深有体会地说:“仁者乐山。”可见,登山也是他的爱好。孟子说:“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这可能并不是修辞上的说法,而是实有其事。孔子登泰山,历史上有不少传说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·方輿汇编·山川典》第十三卷《泰山部》记载,泰山上有“孔子岩”,有“至圣殿”。“在岳巅玉皇顶西稍下可半里许,相传为越观峰,其下为孔子岩。意者孔子登泰山望见吴阊门白马以示颜子,此岂即其地耶?”关于孔子和颜回同登泰山,有一故事。据《论衡》:

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,孔子东南望,吴阊门外有系白马,引颜渊指以示之,曰:“若见吴阊门乎?”颜渊曰:“见之。”孔子曰:“门外何有?”曰:“有如系练之状。”

为什么说是鲁泰山? 因为泰山在齐鲁两国之间,南面属鲁国,师徒二人是从南面登的,没有高山遮蔽,他们才能纵目南眺。这一眺,竟然看到苏州的西门外! 只是颜回的眼力不如孔子,这个学生把一匹白马看成一匹白练。从泰山上应该是看不到苏州的,但也并非全无根据。东汉马第伯《封禅仪记》中说“泰山吴观者,望见会稽”。在秦汉时,苏州是属于会稽郡的。所谓“吴观”,就是泰山上看得到的吴的地点。孔子在泰山上看见吴门,鲜有人质疑。唐人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云:“孔子登山,望吴阊门,叹曰吴门有白气如练。今置曳练坊及望舒坊,因此。”苏州城的里坊都是依此而命名! 不知今曰苏州尚有此二坊否? 明人谢肇淛《泰山》诗:“独立苍茫暗自愁,天边落木正逢秋。片云长自依孤阙,一气谁能辨九州。马向吴门摇匹练,蜃从沧海起层楼。山河指点东南尽,咫尺应同万里游。”登泰山而想到孔子望见吴门,成了此类诗文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后人在泰山上建牌坊,标明是“孔子登临处”,据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,这五个字是明代的状元罗洪先所书。这个地方,大概也就是望吴门的位置,还有一个名称,叫“孔子小天下处”。一物多名,正可见其文化内涵之丰富。王在晋《孔子小天下处》:

置身最高处,扶舆开广厦。

入眠既空明,横襟亦潇洒。

山川在几席,沧海入尊罍。

洪蒙恍闾辟,阴阳本陶冶。

浮沉着飞鸢,氤氲驰野马。

万峰若飞迎,大块如倒写。

广漠测地遥,平明见天泻。

瞻彼陈蔡墟,回翔齐楚野。

于焉发真想,因而小天下。

我们征引此诗,是因为它把“小天下”的意涵剖析得纤细入微。明代文学家李梦阳《郑生至自泰山》:“昨汝登东岳,何峰是绝峰? 有无丈人石? 几许大夫松? 海日低波岛,岩雷起窟龙。谁言天下小,化外亦王封。”好像专门针对前诗而作,我们不妨放在一起看。

孔子登泰山,旅痕处处。作为一种文化意象,泰山成了孔子寄托情绪、表达情感的载体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,在去世前不久,孔子歌曰:“泰山其颓乎? 梁木其坏乎? 哲人其萎乎?”历史给孔子的问题作了回答:泰山不颓,哲人不萎! 斯文精神,与世长存。

■ 我看我说

“夜校热”背后的文化味

●陈世诤

夜幕落下、华灯初上,结束白天的工作后来到学校,舞动水袖唱昆曲、踮起脚尖跳芭蕾……从上海市民艺术夜校超过65万人同时在线抢课,到北京、浙江、重庆等地的夜校受到追捧,“夜校热”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“白天上班、晚上学艺”的场景,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日常。

夜校并非新鲜事物。作为一种社会教育形式,夜校始终承担着改善教育水平、提高文化素质的社会职责,也构筑起几代人的共同回忆。随着社会发展,今天的夜校不断与时俱进。从非遗制作到短视频剪辑,从传统茶道到手冲咖啡,新颖多样的课程,显示着夜校在创新发展模式、走近年轻群体等方面的努力与尝试。

某平台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,“夜校”的搜索量同比增长980%。火热数据,更折射出夜校

近年来主动求索、积极作为的成效。无论是将校址由艺术馆分散到各个社区,还是邀请各领域资深教师、业内专家现场授课,不少夜校通过提升软硬件条件,以期扩大自身的地域覆盖面、内容覆盖面,进而提供更优质、更丰富的文化产品。

对年轻人来说,选择“重返校园”不仅因为夜校经济实惠、内容丰富、时间灵活,更在于其能够精准对接文化需求、激发更多生活憧憬。而夜校“非学历化”的教学特质,也促成了“去功利化”的学习导向。在这里,一些曾经淡忘的爱好被重新唤起、过去放弃的兴趣被再次拾起。这所“成年人的少年宫”,既承载了年轻人舒缓压力、丰富生活的精神需求,也满足了现代人对更新知识、自我完善的价值追求,为忙碌的心灵留

下一片可贵的栖息地。

夜校“出圈”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实践,更是我国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应有之义。近年来,随着《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》《“十四五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》等文件的出台,以夜校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加速下沉,将更多公共文化资源带进普通人的生活,沉淀出更深厚悠长的城市文化。而如何进一步呵护好这股“夜校热”,则对优化政策环境、整合社会资源、提升利用质效等提出了更高的期待。

贴近日常又抚慰内心,追逐艺术又寻找自我,于行色匆匆的城市生活中,找到一条贴近本真的精神之路,这或许是“夜校热”背后更为深刻的意义。

绘事后素

●张艺瑶

“绘事后素”出自《论语·八佾》,子夏问曰:“‘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子夏问孔子《诗经》中的这几句话表达了什么意思,孔子解释为“绘事后素”,意思是有了白色的底子,然后画上色彩。

《说文》:“素,白繒缁也。从糸垂,取其泽也。凡素之属皆从素。”“素”在《说文》中属糸部,其古字形上部是“垂”,像丝物垂下的样子,下部是“糸”,像绞成一束的丝,金文字形中两侧还各有一只手,合起来像是双手执白繒。本义是未经染色加工的原色丝织品。

素即本色,指颜色不艳丽、素雅,又指不加修饰,《释名》:“素,朴素也。已织则供用,不复加巧饰也。”未经染色的丝织品呈现其自然的本色、质朴的原貌,由此还引申为本性、本质等,表示本来的、本质的,作副词时还有原本、向来、平常等意义。

色彩的世界,包容万千。“素”以一种朴素含蓄的方式存在着。绘事后素,顾名思义,

就是先以素色为底,后施五采。

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见于《诗经·卫风·硕人》,是描写美人的名句。女子笑容美好动人,眼目顾盼流转,白净的脸上略施素粉,益增面容之姣好。孔子认为这和绘画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彩绘、妆饰虽美,前提是必须在白底上设色,这样才能有之后的绚烂呈现。

《八佾》的故事还没讲完。子夏接着问孔子:“礼后乎?”意思是礼形成于(仁德)之后吗? 孔子喜而赞道:“起予者商也! 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认为子夏能够阐发他的意思,可以与他谈论《诗经》了。

子夏经过孔子的提点,联想到礼与仁的次第和内外关系。他以素色喻仁德之质,意谓礼形成于仁德的基础上,产生于对仁德的追求中。当有了仁心,有了道德,心中自然就会发出对礼的向往与追求。可见礼并不是强加于人的,而是人自然天性的进一步生发与延伸。礼可以说是仁的外在显现,这两者之间,存在本末与先后的关系。先有仁,再有礼,仁属

内,礼属外,仁是体,礼是仁的发用。钱穆对此注解道:“子夏因此悟人有忠信之质,必有礼以成之。”

钱穆又说:“礼乃后起而加之以文饰,然必出于忠信之美质,犹以素色间于五采而益增五采之鲜明。”礼发端于仁义的本质,同时,礼的形成也让仁有了更加丰富的表达、焕发出更美丽的神采。纹饰与素质融为一体,才是真正的美。君子之风就是这样,由内自外,文质一体,浑然天成。

风雅并非来自巧饰,而是以内在的干净纯真作为底色。这个道理体现在从社会生活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。《易》言:“素履,往无咎。”朴素无华、正道而行,自然不会有咎害。《道德经》言:“见素抱朴,少私寡欲。”五色令人目盲,保持纯净朴素的心性,可见精神之本真。写作亦是如此,华丽的词藻之下如果缺乏真实的底色和清晰的理解,只会带来含混和模糊。应该去追求删华就素的简与美。

懂得了素的可贵,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生命的本质,守住本心。倘若在人生这张白纸上胡乱涂鸦,一片繁杂艳色,反而失去了美丽。当过多的装饰盖过了素净的白底,就难再找回本来面目了。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对质朴的生命本质的坚守,让我们不断去提升与淬炼生命珍贵的品质,让素净的底胚显露出原本的光辉,保证生命底色的明亮。

宋人的食蟹风尚

●钱仓水



明代徐渭的《黄甲图》中,肥阔的荷叶开始凋零,表现了秋天蟹行荷叶下的情态。

资料图片

宋人喜食蟹,两宋的300多年里,社会上始终风行食蟹。“蟹肥无复羡鱼虾”,“不食螃蟹辜负腹”,“古来把酒持螯者,便作风流一世人”,观宋代诗文可知,螃蟹已经成为彼时人们餐桌上一道常见的美食。

著名学者陈寅恪说中华传统文化“造极于赵宋之世”,除了文学、哲学、艺术等领域,在生活美学方面,宋代也卓有成就,而食蟹文化就是宋代饮食美学的代表之一。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,都对食蟹之趣津津乐道。而文人士大夫自然是将蟹文化上升到美学高度的主力。爱食蟹的文人名士常成群结队地出现,兹举几例。

宋庠、宋祁是亲兄弟,安陆(今属湖北)人,同举进士,为文史学家,时号“大小宋”。他俩都喜食蟹。哥哥宋庠诗云“衔杯思左蟹,舒啸忆东皋”(《别墅冬霁》),“左手蟹初美,东篱菊尚开”(《和运使王密学见赏公醞》),“左手香蟹伴醉眠”(《醉枕》),可见他喜爱蟹到了饮酒而思、食蟹而赞、持蟹而眠的地步。

弟弟宋祁因一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而得了“红杏尚书”的雅号。宋祁诗云“黄鸡跼跼美,紫蟹螯螯香”(《谯集》),是说黄鸡的脚爪,爪爪都好吃,紫蟹的蟹螯,蟹螯都喷香,“下筯未休资快嚼,持螯有味散朝醒”(《吴中友人惠蟹》),为了供上嘴吃,筷子都停不下来,美味的蟹螯,让宿醉引起的疲倦一扫而光。嗜蟹的鲜活情态毕现。

梅尧臣、欧阳修、苏舜钦等人是在洛阳相识的至交文友。梅尧臣是宣城(今属安徽)人,被称为宋诗的开山祖师。梅尧臣的家乡宣城是知名的螃蟹产地。“淮南秋物盛,稻熟蟹正肥”,他常常以此而自豪。梅尧臣还关注各地产蟹情况,视螃蟹丰产为物阜民丰的标志之一。他一生喜食螃蟹,有“宴盘紫蟹方多味”(《送润州通判李屯田》),“可以持蟹螯,逍遥此居室”(《凝碧堂》),“前日扬州去,酒熟美蟹螯”(《前日》),“得意美鱼蟹,白酒问沙头”(《送张唐民》)等咏蟹的诗句。他以食蟹为乐,给后辈同乡郭祥正留下深刻印象。郭祥正在《哭梅直讲舍人》诗里回忆,“邀我采石渡,烂醉霜蟹肥”。在安徽当涂采石渡的一个秋天,老少二人曾以蟹佐酒,吃得烂醉。

欧阳修是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,北宋初文坛领袖,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他在诗里回忆起与梅尧臣、苏舜钦“对酒把新蟹”的快乐时光。他对梅尧臣有“是时新秋蟹正肥,恨不一醉与君别”的遗憾。人家寄蟹给他,欧阳修便喜不自禁。人家请他吃饭,他要求对方罗列螃蟹。这些都透露了他们的饮食旨趣。欧阳修特别喜欢颍州(今安徽阜

阳)的螃蟹,说“颍水肥鱼蟹”(《戏书黎教授》),在给儿子的信中说颍州“巨鱼鲜美,虾蟹极多,皆他郡所无”(《给长子欧阳发》),而且价钱还很便宜,“闲居之乐,莫此若也”。

苏舜钦是开封(今属河南)人,为官时被倾陷,削职后流寓苏州,筑沧浪亭,读书写作以寄愤懑。此时,梅尧臣寄诗劝他“鱼蟹时可嚼”,他就“二螯时把蟹”,“霜柑糖蟹新酷美,醉觉人生万事非”(《小酌》)。在《答范资政书》里,苏舜钦更说“不得已遂沿南河,且来吴中,既至,则有江山之胜,稻蟹之美”。他把苏州的风景之胜与稻蟹之美并列。

苏轼与黄庭坚世称“苏黄”。苏轼是美食家,自称老饕。在《老饕赋》里说“嚼霜前之两螯”,“蟹微生而带糟”,两次提到蟹,可见其推崇之情。苏轼在吴兴当太守的时候,友人寄来蛸蟀(俗称梭子蟹),他竟在《丁公默送蛸蟀》诗里说“堪笑吴兴馋太守,一诗换得两团团”,罕见地在诗中用一个“馋”字形容自己,可见爱蟹之深。苏轼从小不喜杀生,然性嗜蟹,故不免杀,经“乌台诗案”入狱后,有见饕餮者,皆放入江中,可是被流放到惠州时又破戒,“数食蛤蟹”(《东坡志林》),还是不能顶住蟹味的诱惑。

黄庭坚是分宁(今江西修水)人,曾为国子监教授等,江西诗派的宗师。他迷恋食蟹,“每恨腹未沃,夸说齿生津”(《次韵师厚食蟹》),总觉得蟹的“风味极可人”(同上)。晋朝吴郡吴人张季鹰在洛阳为官,见秋风起,因思吴中鲈鱼脍,便辞官东归,可是黄庭坚却说“东归却为鲈鱼脍,未敢知言许季鹰”,认为吴中的稻蟹风味更美。

其实,在苏黄的周围聚集着很多“嗜蟹者”,苏辙“频梦江湖把蟹螯”,张耒“紫蟹双螯荐客盘,倾来不觉酒壶干”,秦观“左手持蟹螯,举觞属云汉”等,仿佛形成了一个“食蟹者美食联盟”。

陆游、杨万里互有唱酬,均为爱蟹之人。陆

游是越州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南宋诗人。他一生好酒嗜蟹,在外任官时,“思归更向文书懒,此手惟堪把蟹螯”(《初秋书怀》),晚年在家时,“残年更何事,持蟹酌松醪”(《寒夜》),甚至说“有口但可读《离骚》,有手但可持蟹螯”(《悲歌行》),一个是精神陶冶,一个是物质享受,被陆游同等看待。陆游的诗里充满了对蟹和酒的喜爱,“蟹羹旋饕餮涎涎,酒渍初倾老眼明”(《病愈》),手里刚拿着蟹黄,口水就滴滴答答地淌了出来,清酒才从瓮里倒出来,昏花的老眼顿时发亮。

杨万里是吉水(今属江西)人,诗为“南宋四大家”之一,文亦新巧。他好食糟蟹,“霜前不落第二,糟余也复无双”(《糟蟹六言》),给了糟蟹极高的评价。其《糟蟹》诗更有具体描写:“酥片满螯凝作玉,金穰熔腹未成沙。”在《糟蟹赋》里,杨万里又说,糟蟹“能纳夫子于醉乡,脱夫子于愁城”,实在是一种独特的佳肴。

宋代文人爱食蟹,咏蟹诗也层出不穷。翻翻《全宋诗》,就有一百几十位诗人写过咏蟹诗或涉蟹句。苏轼除了《丁公默送蛸蟀》外,还有19首诗涉蟹。黄庭坚写了8首咏蟹诗,陆游除了《糟蟹》等4首咏蟹诗外,还有60多首诗涉蟹。宋诗中咏蟹的名句也有不少,黄庭坚“形模虽入妇人笑,风味可解壮士颜”(《谢何十三送蟹》),张耒“匡实黄金重,螯肥白玉香”(《寄文刚求蟹》),徐似道“不到庐山辜负目,不食螃蟹辜负腹”(《游庐山得蟹》)……千百年来自引得无数食客共鸣。

宋诗中有不少写重阳节吃螃蟹的佳句,比如苏轼“无限黄花簇短篱,浊醪霜蟹正堪持”(《次韵张恕九日寄子瞻》),陈造“重阳佳辰可虚辱? 橙香蟹肥家醖熟”(《招郑良佐》)等,其他像“迎霜紫蟹新”“稻熟蟹正肥”“持蟹赏菊花”等句,也常出现在宋诗里。

除了出现在诗词中,蟹也常出现在宋人的散文中。苏轼的《艾子杂说》、杨万里的《糟蟹赋》、

姚铉的《江淮之蜂蟹》等,从各个侧面描写了蟹的情态。螃蟹也不总是受到人们喜爱。在宋人的文章中,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还发生过蟹多成灾的情况。范浚在《蟹赋》中说,因为螃蟹横行害稻,“吾将听尔螯,折尔股,以除衣袂兮酣我醪”;高似孙在《松江蟹舍赋》中说,太湖支流松江的蟹,“其多也如涿野之兵,其聚也如太原之俘”,于是捕捉后主客举酒食蟹,“刳甲如山”,挖空的蟹壳堆积如山。

宋代各行各业的老百姓亦多好蟹者。“篙师知蟹窟,取以助清樽”(梅尧臣《褐山矶上港中泊》),在水上撑船的人,一眼就能认出螃蟹藏身的洞窟。有个公子哥儿李健,“喜食糟蟹,自造一大坛凡数百枚”(庄绰《鸡肋编》),竟造了一只可装数百枚糟蟹的“大坛”;有个叫杜相的人,大家见他咳嗽痰多,劝他别吃蟹,他却说“痰咳发犹有时,螃蟹过了却便没”(江修复《杂志》),仍食蟹不止。

据傅肱《蟹谱》:“旁蟹盛育于济鄆,商人羣负,轨迹相继,所聚之多,不减于江淮”,商人车载肩挑,把山东盛产的螃蟹络绎不绝地贩运到都城开封。据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说,“蟹行,新门外南上门”,顾名思义,蟹行当是一手从捕蟹者和贩蟹者买进,一手又卖给酒家和普通百姓的商行。南宋武林(即都城临安,今杭州)的“蟹行”记录,反映了大众喜食螃蟹的程度。据洪迈《夷坚志》记载,“平江(今苏州)细民张氏,以煮蟹出售自给,所杀不可亿计”,一个摊位就供应如此之多的螃蟹,可以想见,当时是何等盛大的倾城食蟹景象。



南宋的《荷蟹图》是荷叶与螃蟹题材较早的作品。

资料图片